

西夏文字与西夏文献

(苏联) · · 聂历山(著) 崔红芬¹ 文志勇²(译)

(1.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2.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组织部,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杰出的西夏学者 · · 聂历山在整理研究和译释俄藏西夏文献的基础上,对国际西夏学早期研究状况和俄藏西夏文献的全貌作了简要介绍,尤其对我国学者至今了解不多的西夏宫廷颂歌和诗体作品如《新集锦合辞》和劝世教导类文献《贤智集》、《德行集》的部分内容作了力所能及的译释。我国学者经常提到聂历山的研究成果,但至今尚未见到聂历山论著的译文,现据《西夏语文学》译出,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希望为我国西夏学研究者提供某些有价值的线索。

关键词 俄藏西夏文文献;宫廷颂歌;《贤智集》;《德行集》

中图分类号 K2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91(2006)01—0064—07

现代学者都很熟悉,10 世纪时党项人建立的国家名为“西夏”,当时的汉文史料即将这个国家称作“西夏”,该国的主要居民是党项人,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把这个民族称作“党项”,据西夏文献记载,当时党项人自称为 *mi* 或 *mi- hiä*,汉文译作“番、弥”或“弥药”。其中的第一个称谓,大概是与藏文中表示“人”的 *mi* 字属同一词源,第二个称谓,大概与 *mi- nag* 一词相同,都读作 *mi- nak* 或 *mi- nä*。藏人用它来称呼黄河以西之地,党项人就曾居住在那里,汉文称此地为“河西”。

“党项”一词 *tangut* 大概是由古代部落的名称 *tan* 添加后缀 *- ut* 构成。此后缀可能来源于蒙语。在蒙语中,某些名词加上后缀 *- ud* 构成复数。*tangut* 之称谓早在元代以前就已经出现,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史证有和硕柴达木出土的 734 年所立汉、突厥文碑《毗伽可汗碑》。由部落名称 *tan* 所构成的称谓中,可能还有 *Tan- xo* 即“党河”,它流经西夏故地沙州,即今甘肃省敦煌县境内,古代称党河为“都乡河或氐置水”,那里曾生活着氐人,中国古代史料中称中国西部地区的吐蕃——党项部族为“氐人或羌人”。《旧唐书》“党项传”中说:“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内部不相统一。有细封、费听、往利、颇超、野辞、房当、米擒、拓拔氏,而拓拔氏最为强族。”这些不相统一的党项各部族是如何摆脱宋朝统治,建立起独立统一国家的,对这段历史我们尚不完全清楚。几乎作为唯一史料来源的汉文历

史记载又很不完整,且常常是自相矛盾,相互抵牾。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珍藏的科兹洛夫黑水城收集品当中,有一件 1185 年刻印发行的西夏文刊本文献,我在该文献正文页面的背面,发现了五首手写的西夏文颂歌,其中一首的内容颂扬了西夏皇族的祖先。在我看来,这首颂歌的内容相当有趣,它透露出党项人早期崛起历史的某些信息,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但可惜的是,颂歌中有很多的西夏专有名词,确定这些名词的读音相当困难,且颂歌中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字,以我现有的西夏文知识尚不能完全释读和翻译出这些颂歌,但我还是想介绍一下我所能释读出来的该颂歌的部分内容,其开头内容如下:

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塚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

我认为,党项人在这几句颂歌中,确定了自己国家从北到南的地理疆域,即北到沙漠戈壁,南到发源于岷山的白河或白水。吐蕃东部直接与岷山一侧的甘肃南部相毗邻,藏人至今称此地为 *Kham (s)*,或 *kham- mi- nak, mi- nak*。正如我们所见,藏人用这个词表示党项人建立的国家,党项人自称为 *mi- hiä*,汉文译作“弥药”。中国古代史料常把中国西部的党项——吐蕃部族称之为“羌人或氐人”,上面所说的白水,又称作“羌水”,生活在这里的党项——吐蕃部族被称作“白水羌或白水氐”。这又一次证明了白河流域也曾是党项人的居住地。当党项人摆脱宋朝统治,

收稿日期 2005—04—18

作者简介: H·A·聂历山(1892—1938) 男,苏联杰出的西夏学者和东方学家,代表作为《西夏语文学》。

译者简介: 崔红芬(1968—) 女,河北河间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夏佛教研究。

文志勇(1966—) 男,甘肃兰州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组织部干部。主要从事苏俄西夏学研究成果的汉译工作。

建立国家以后，党项人遂以其原居住地的名称把自己的国家称作“白河上游之国家”，简称“白上国”。

党项人从何时起决心要独立，其时间还很难断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7世纪以前，党项各部族就已经相当强盛，中国中央政府意识到这一点，竭力与其搞好关系，采取措施笼络他们。《旧唐书》记载：“贞观三年（629），南会州都督郑元寿遣使招谕，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步赖因来朝，宴赐甚厚，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

从以上这首颂歌的内容来看，党项人认为某个叫“刺都老子”的人是党项皇族的祖先，他曾几何时不愿意为小，胸怀大志，娶藏族姑娘为妻，她为他生了七个儿子。颂歌中对这位藏族姑娘作如下描述：

母亲阿妈起族源，银白肚子金胸脯，贵种不断嵬名氏。

目前我还尚未发现汉文史料中有哪个人物的名字与“刺都”相等同，而嵬名氏，我在论文《西夏国名校考》中已经说过，它是西夏皇族姓氏，汉文史料中音译为“嵬名或于弥”。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句子则更为有趣：

从此苗裔广流传，出现弥人名瑟胡（'mi Se-huo），

出生即有两颗牙，长大成就十件功，率领七骑欲称王。

在宋代史料当中我找到了以下关于西夏第一个皇帝继迁的部分记载：“建隆四年（963），继迁生于银州无定河畔，生而有齿。”将这两条西夏文和汉文书写的史料进行对比，即可清楚地知道，这两份文献记载的其实是同一个事实，但各自所提到的人物姓名却不相同。由于西夏文中的名字在意义上与汉文中的“继迁”不相吻合，所以我认为，汉文名字“继迁”既不是西夏文名字 Se-huo 的意译，也不是音译。在汉文史料记载中，继迁是西夏的皇帝，但在西夏国，可能是为了避讳的缘故，所以颂歌把继迁的名字改成了他曾担任过首领的某一支党项大部族的名称。我们已经知道，在《旧唐书》中所列举的党项大部族中，有细封氏，史书中曾提到过该部族的其中一位首领叫细封步赖。汉文中的“细封”在读音上很接近西夏文中的“瑟胡”。如果我的判断是准确的，那么西夏的第一个皇帝继迁出身于党项大部族细封氏中的一支——嵬名氏，他恰好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担任该部族的大首领。假如认为汉文编年史中的年代记载是错误的，并把瑟胡等同于细封步赖，那么势必要把西夏第一个皇帝的生日一下子提前300多年，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无论事实如何，到10世纪末期，党项人终于摆脱了宋朝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开始创造自己独特的西夏文明，我们可以根据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及国立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西夏文献资料和艺

术品来认识和了解这个文明曾经拥有的发达程度。

欧洲学者见到的第一份西夏文献，是1345年蒙古统治时期雕刻在居庸关城门墙体之上的六体石刻，这时西夏国早已丧失了独立主权，于1227年灭亡。我不想在此叙述从1870年开始的西夏研究第一阶段中释读西夏文字的整个历史过程，我只想说明一点，法国著名学者沙畹确定了某些西夏字的近似读音，尽管有很多字都不具有现实而迫切需要的意义；毛利斯解释出了几十个西夏字的意义并开始研究西夏语语法，可以说他们是西夏研究的创立者。1908年俄国著名的探险旅行家科兹洛夫从蒙古戈壁上的西夏故地黑水城中发掘出大量的西夏文刊本和写本，文献数量之大，堪称一整座图书馆，送入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收藏。至今没有任何国家的西夏文献藏品能在数量上或内容上超过这批文献。伊凤阁教授在藏品中发现了后来轰动一时，颇引人注目的夏汉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他已经公布了其中的部分内容。1916年美国学者劳弗尔在伊凤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了西夏语在印支无形态语中所处的位置，认为它近似于傈僳语和摩梭语并将此三种语言列为一组，称作“西—傈—摩语组”。

英国著名探险旅行家、学者斯坦因，在他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继科兹洛夫发现大量的西夏文献文物以后，也曾探访过黑水城遗址，并将很多的西夏文献带回英国，根据目前公布的样本情况来看，其中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献。法国学者伯希和教授在中亚考察期间也发现了很多西夏文献，我个人只见到过几幅不大的佛教文献残片的照片。中国国立北平图书馆和著名收藏家罗振玉近年来也搜集到了数量可观的西夏文刊本和写本，内容基本上也都是佛教文献。在中国，曾有一些西夏文佛教文献出售，被日本京都大学购得。在德国，除了几卷从毛利斯手中获得的《妙法莲花经》以外，还藏有几幅不大的西夏文残片，冯·察赫已刊布发表了其中几件。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西夏文字研究领域内成绩显著，特别是罗福成和王静如两位学者，他们于1932年出版了庞大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专刊》西夏文专号，其中有几篇罗氏兄弟中最具前途厚望的小弟罗福苾的遗作。王静如最近出版了自己的西夏研究成果汇编《西夏研究》，特别是他的成果之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除过发表在各种杂志上的零散文章以外，自1932年至1934年，他一下子出版了三大卷约1000页内容的宏篇巨著《西夏研究》。但他的论著大部分都有些早产，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推敲和修改，他对西夏文献的释读，大部分都有西夏文字互相混淆和遽下结论的硬伤。几年前美国学者沃尔芬登根据我在日本发表的一篇旧作撰写了一篇不太长的，支持西夏文词汇的藏文音译中带有前缀字母观点的文章。不久前他又在研究了我发表的全部论文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篇内容更加充实的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论文撰写得十分及时、规范，但我对他的其中一些观点并不赞同。

综上所述,截止目前,各国学者在释读西夏文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还很少很少。在语义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大,因为已确定了西夏文字的数量及排序意义。在通过西夏文字分析以揭示其文字结构方面,除罗福苕进行过一些尝试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成绩可言。语音学方面的研究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王静如努力尝试着释读了很多的西夏字,但这些读音却根本没有说明其理由,其中很多字的发音是相近似的,有些甚至是臆想杜撰出来的。在语法方面,除了毛利斯、罗福苕的论著和我的一篇较短的关于西夏语气助词的文章外,也善乏可陈。西夏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如此之少,我认为原因如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所收藏的西夏文献资料都特别匮乏,而且文献资料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现存的西夏文献,除俄藏文献外,大部分都是佛教文献。即使学会了分析某一篇短小的,其中充满了大量的佛教术语且内容也几近同质化的佛经以后,研究者也无法从佛经释读研究逐步过渡到世俗文献释读研究上来,因为他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量的他所不认识的西夏字,会陷入困境而束手无策,无论怎样释读佛经,都不会为他释读哪怕是一行或两行世俗文献,提供任何可供帮助的新字。

正如我们所见,党项人为了使自己的语言长存于世,并没有采用他的伟大邻邦——中国(指宋朝)成熟的象形文字——汉字,而高丽、日本和越南在自己的语言中就引用了汉字。党项人也没有采用藏语的字母文字,而是像契丹人和女真人那样,决心在语言文字领域中展示其充分的独立性,从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类似汉字的象形文字,但在形状上却更加复杂。劳弗尔在论及西夏文字时说:It is perhaps the most complicated system ever invented by a human mind(西夏文字大概是人类智慧所能发明的最为复杂的文字体系)。通过对西夏文字的分析表明,西夏文字的创造者深受汉字形状及其结构的影响。

汉文史料中对西夏文字创制的记载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第一种,西夏文字是由西夏第二代皇帝李德明创造,见《辽史》“西夏传”、《书史汇要》;第二种,是由西夏第三代皇帝李元昊创造,见《宋史记事本末》、《隆平集》、《金史》“西夏传”;第三种,元昊自创西夏文字后,委托学者野利仁荣进一步充实完善,见《宋史》“夏国传”;第四种,元昊委托(野利)遇乞发明西夏文,遇乞独居一高楼之上,数年方成,呈给皇帝,见宋沈括《梦溪笔谈》、明王齐《续通志》。中国现代学者多倾向于宋史记载,认为遇乞与野利仁荣是同一个人,并认为,某些史料中记载西夏文字的发明者为李德明是错误的,应更正为李元昊。宋史中记载,1162年仁孝皇帝追封已故制蕃字师仁荣为“广慧王”,使得人们更有理由将遇乞与仁荣看作是同一个人。由于我们还没有西夏历史文献来揭开创造西夏文字的秘密,在这个问题上还只能依靠汉文史料记载。但是,在我所提到的那五首西夏宫廷

颂歌中,有一首为纪念西夏文字的创造者“伊利大师”而创作的颂歌,以下是我目前所能释读出的部分内容:

颂扬...大师的仪式:

1. 藏人汉人和弥人,三人本是一母生,居地不同语殊异。西方遥耸高吐蕃,藏人记事用藏文。

5. 极东低地居中国,汉人记事用汉文。各有语言各珍爱,吐蕃中国尊其字,我国自有伊利师。

10. 文曲星君升东方,创造文字映夕阳。挑选弟子三千七,悉心教导皆成师。州郡处处用蕃字,高天之下读己书,自定礼仪自尊行。

15. 为何不跟吐蕃走,吐蕃向我来鞠躬。天下事务我作主,自定官制自任用。为何不服中国管,中国已向我低头。皇族苗裔不间断,弥药才俊代代传。

20. 试看衙门诸所中,弥药官吏最为多。诸般请君细思量,非师之功是哪个?

根据这首颂歌的内容来判断,西夏文字的创制者姓“伊利”,这似乎与汉文史料中所记载的“野利”较相吻合。因为野利本属契丹姓氏,因此可以推想,西夏文字的创制者也可能是契丹人。但我在一份记录纯粹的党项人名字的西夏文书中,也看到了“伊利”这个姓氏,颂歌中所记载的契丹姓氏“伊利”,党项人也读作“野利”。大概,由于汉语中无r这个读音,所以中国的历史学家就把党项姓氏“伊利”和契丹姓氏“野利”相混同,将两者都写作“野利”。颂歌中没有提到西夏文字创造者的名字,但提到了某种为纪念伊利大师而举行的仪式,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该仪式大概指的是1162年为野利仁荣追赠荣誉封号“广慧王”时举行的庆典,如果这样,那造字者的名字就必定是仁荣无疑,而且“仁荣”在汉语中有十分明确的意义,两个汉字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特殊的名字,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党项人名字的汉译。

党项人在颂歌中用“西方遥耸高吐蕃”、“极东低地居中国”这样的词句描述了自己国家所处的周边环境。有吐蕃和中国这样的邻居,他们势必对西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造成很大的影响,还有契丹,当然了,契丹文化对党项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党项人在自己的诗歌作品《碎金置掌文》中,曾这样形容自己和周边邻居的特征:

弥药勇健行,契丹缓步行,藏多敬佛僧,汉皆爱俗文。

看来,吐蕃以自己的宗教——佛教对西夏施加影响,而中国在西夏周边邻近民族中文化最发达,因而在世俗生活方面对西夏产生影响。当时的吐蕃王公贵族竭尽全力保护佛教僧人及弘法者,这些弘法者常常是从印度来到吐蕃的佛教徒。这时吐蕃正在加紧翻译佛教经典《大藏经》,为后来编纂《甘珠尔》奠定基础。西夏帝王仿效吐蕃王公也开始在自己的臣民当中大力推行佛教,并创制了西夏文字,还与太后、皇后及有影响力的贵族僧侣一起共同将藏、汉文佛经译成西夏文。之所以翻译汉文佛经是因为当时中国已有几乎完整的大藏经,而吐

蕃似乎还没有。为了获得这部汉文大藏经,西夏的皇帝不只一次地向中国求赐佛经,并进献马匹和珍宝作为交换。西夏的皇帝,尤其是仁孝,在各方面都很像是半宗教性质的统治者,宫廷颂歌也称颂皇帝是“仁慈的菩萨皇帝”、“佛陀天子”。根据仁孝皇帝为《观弥勒菩萨足知皇上生观经》西夏文译本所撰写的序言内容判断,在某些庄严的宗教祈祷法会上要用西夏文、藏文和汉文等三种语言诵读三藏经文。雕板印刷《观弥勒菩萨足知皇上生观经》西夏文本和汉文本共10万部,《金刚经》、《普贤菩萨行愿品》、《观音菩萨普门品》各5万部,所印经文皆散施信众。从以上所列的印经数量上就可看出,西夏推行佛教的力度该有多么的强大。

西夏的皇帝、皇后、太后和贵族僧侣们热心译经事业,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他们没能译出所有的汉文大藏经文,也起码是译出了其中的绝大部分经文。我在苏联亚洲博物馆的藏品中发现了译成西夏文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种咒王荫大孔雀经》、《大般涅槃经》、《大方等大集经》、《佛说甘露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花经》和《维摩诘所说经》,还有很多短小的佛经,其中包括《观弥勒菩萨足知皇上生观经》和《金刚经》,后两种经文在藏品中有各种规格、各种字体的刊本形式。上述某些经文,特别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甚至会存有两种或三种不同的手抄文稿版本,这证明,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佛教徒为积累功德,抄写了大量的经文,因为几乎所有的经文都要求信徒抄写经文,许愿说这样做会增加来世功德。在印刷术尚未出现或普及以前的年代里,这种抄经活动,是书籍出版者必须要做的事情,当然了,这同时也具有传播佛教的目的,抄经者们以此来帮助法师弘传佛教,巩固僧侣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在俄藏佛教文献中,论部和律部经文特别稀少,大部分情况下,此两部的经文只保存有一些较短的、不太完整的经卷。此类作品有《大庄严本母卷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注由义释补》(南条第1602号)、《瑜伽师地本母》、《西方净土十疑论》(南条第1574号)、《诸说禅源集都序》(南条第1647号)、《大乘阿毗达磨本母》、《阿毗达磨正理与随本母》、《宝藏论》、《根本一切有说部目得迦》、《根本一切有说部百一羯磨》等。

上述经文都译自汉文佛经。俄藏黑水城佛教文献中还有很多译自藏文的西夏文佛经,像这样的经文有《圣胜慧彼岸到八千经》、《佛说佛母三法藏出生般若波罗密多经》、《圣柔吉祥之名真实诵》、《五部护持经》、《菩提勇识之业中入顺》、《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二谛于入顺》、《圣胜慧彼岸到要论教学现量解庄严论显颂》、《正理滴之句义显具》、《等持集品》、《菩提心发法事之诸根》、《七种功德谈》、《胜住令顺法事》、《聚轮供养作次第》,以及大量的具有论证性质的密教著作和各种颂扬嘿金刚、上乐金刚和金

刚亥母等密教诸神的赞颂,还有一些作品是吐蕃备受尊敬的大译师纳罗巴和尊者米拉日巴大师所编写的。

除了翻译佛教典籍文献外,西夏人自己也创作了独具特色,带有或神秘、或观想、或说教性质的论著。从这些论著中可清晰地看到完全模仿吐蕃佛教著作的痕迹,吐蕃此时尚处在大力翻译梵文佛教典籍的时期,藏传佛教也还远不具备哲学的特征,佛教论著中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也主要是道德说教和神秘论调。而西夏佛教徒所创作的论著,想必是既仿效了藏传佛教论著的模式,又运用了很多中国古代历史故事作为例证。

在撰写说教题材论著的作者当中,有一位大度民寺的僧人叫宝源,他还因将佛典由梵文译成汉文而著称于西夏。在藏品中有一部宝源创作的篇幅不长的著作,名曰《贤智集》,为雕板刊印本,根据书中题记判断,它印行于1188年。书中充满了种种道德说教,如论述酗酒、淫乱的危害,对世俗女性的编派等等。在这部散文体的作品中夹杂着警示内容的诗句。为使大家更好地认识这类作品,笔者现摘录书中对世俗女性的一段议论译之如下:

但凡世俗女性皆罪孽深重。佛曰:女人在撒谎虚伪方面远甚于男子。她们当中,有的人梳洗打扮,涂脂抹粉,有的人身穿五彩绣花锦袍,迷惑那些蠢笨的男人;有的人拿腔捏调,扭妮作态,斜着眼看人,她们浅唱大笑,还有的人吟唱着悦耳的词曲,观察着听众的反应;有的人或挺胸叉手,或垂首勾面,或徜徉在路上,摇摆着身体,并自我欣赏着这种感觉,又或者,挑眉凝眸,时而假作忧愁,时而装作欢乐,以此来迷惑那些蠢汉,使他们心神不宁,窘迫难安。凡此种种诡计和搔首弄姿实难一一列举。她们迷惑住那些愚蠢的男人,并使他们丧失性命。她们如同凶恶的强盗,诡计多端,她们又像外表华丽的饰彩粪桶,使男人迷惘不清。她们就像是捉鸟捕鱼的网套,又好比是隐蔽的陷阱,专等瞎子落入。她们宛如飞蛾投身的篝火,又如蝇蛆盘踞的恶臭腐尸。亲女色则破国亡家,与女色接触就如同捕捉毒蛇一样危险。她们虽嘴甜如蜜,但心似恶鹰。家庭的贫困与痛苦,皆由女性所引起;有的男人为了女人走进沙漠,从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家庭的纠纷不睦都是因为女人;儿女们不孝敬父母,也是因为女人;兄弟之间反目成仇,也是因为女人;亲人疏远不亲,也是因为女人;今后的生活遭到报应,也是因为女人;男人不能超生天国,也是因为女人;向善之路不通,也是因为女人;无法获得正果,也是因为女人。凡此种种罪孽实难一一尽述,如此众生怎不可怜可叹?她们无法逃避末世地狱之火的焚烧,因此她们的痛苦将无穷无尽。

但是在西夏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僧人,也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僧人所宣扬的世间一切皆浮生如梦、转瞬即逝的说教,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满足于那

些讲解禅定观想方法和僧人制定的生活准则的佛经及其阐释。西夏是一个从宋朝统治和压迫之下挣脱出来的年轻国家,君主们竭尽全力避免自己的国家再次被他国奴役,决定用中国的儒家思想作为强大的精神武器来武装起国内的统治阶级,使民众逐步地适应中国的封建文化,以此与自己的竞争对手相抗衡。正是出于这种目的,西夏于1145年设立汉学院,又称大汉太学,汉学院教授担负起宣扬、普及儒家思想的重任,翻译了大量的汉文书籍。西夏最先翻译的汉文书籍大概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们的经典论著,后来学者们又为这些著作提供了各种版本的注释,并采用中国古代军事史中直观而明显的事例来说明书中的军事理论。这些著作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中国和其它有汉文化背景国家的军事将领们学习战略战术兵法思想的经典教科书。翻译这样的军事论著对西夏君王们建立起国家正规的军队大有帮助,这些军队要能够担负起与外敌进行正确的进攻和防御战争,包括进攻中国沿边省份和防御蒙古军队入侵、对内镇压起义和叛乱的任务。根据中国史料记载,西夏曾多次发生过起义和叛乱事件。

像这样的军事论著在俄藏文献中有以下几种:

(1)《孙子兵法》三种注释译本,即《孙子》魏曹操、唐李全及唐杜牧三种注释译本。

(2)《黄石公三策》及注释译本,相传该书为黄石公撰写。

(3)《六韬》译本,无注释。

以上书籍在藏品中皆为刊本,这证明西夏十分重视这类有实用价值的书籍并大量印行流布。除军事知识外,西夏也注重吸收儒家思想,其主要目的是教导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教导臣民如何驯服顺从。据宋史记载,最早倡导翻译汉文经典著作的西夏统治者是李元昊(1032—1048),最初所译文献有宣扬孝悌思想的《孝经》和传统辞书《尔雅》。

这类书籍在藏品中有以下几种:

(1)写本《孝经》注释本新译,保存基本完整,只缺第18章最后的结尾部分,用类似草书的斜体字匆匆写就,释读起来非常困难,但更难的还在于断定它的注释者为何人。但是,通过对它称之为“新文”的主要内容经过认真分析以后,我逐步适应了译者的书写风格并看懂了前言。根据序跋内容判断,此书是宋绍圣二年(1095)由著名的学者吕慧卿注释,在藏品中,还有他注释的《庄子》一书。但遗憾的是,本书没有指出它的西夏文译者的名字。

(2)刊本《论语》注释本译文。此书的注释与现存的几种汉文注释本皆不相同,但仍可看出,它参照了以上几种汉文注释。因该书保存极不完整,只剩下一些残片,所以很难断定它的注释者。但可以推测,本书的注释者与正文内容的翻译者可能都是西夏的宰相和著名学者斡道冲。据汉文史料记载,他曾为《论

语》作注,取名为《论语小义》。

(3)写本《孟子》译文残片,附有不太规范的注释。

(4)刊本《贞观政要》译文残片。原书为唐吴兢著,系中国皇帝唐太宗与其大臣在贞观年间的谈话记述。

还有一些当时较为流行的汉文书籍译本也属于此类,比如记录春秋时期12诸侯分封国历史事件的《十二国》(也许就是宋本《十二国史略》)和记载各种内容的《类林》,后一部书仅存4—10卷,包括忠臣、叛逆、方术、名僧等内容。

党项人自己也编写了一些取材于各类汉文书籍译文内容的作品集,目的就是要让西夏人接受儒家思想的教导。如藏品中有一部写本《新集慈孝传》,汇集了中国汉文正史记载的关于子女、兄弟和妻子等节义孝悌之行为的各种故事,编者大约是位汉人,名曹道安或道乐。像这一类作品,无论是西夏人自己创作的,还是根据汉文作品改编的,其形式和内容都相差无几。这类作品中大量引用摘自汉文经典著作中关于道德论述的名言语录,这些名言语录还曾以单行本的语录体文集形式刊行于西夏国内。藏品发现有两部西夏的原创作品,皆名为《德行集》。其中一部大概是为皇帝和贵族大臣们所撰写的,其中阐述了以儒家思想从小培养国君如何修身治国的理论,还提到了为国君选择合适的老师进行教导等问题。第二部同名书籍阐述了所谓的君子。现将第二本书中片断内容译之如下,以窥全貌之一斑:

凡君子者,无不尊行礼仪,信守诺言,孝敬父母,履行义务。他明查贤愚,清辨是非,求多而心不乱,谋利而不为非,毁誉而心不移,伤痛而不作恶。他德行宽厚,心志坚定,因曰其清纯如水,此君子之本性也。或曰,君子行如日光月华,才比高山深谷,依四季之时,合天地之数,君子如日月之明,普照万物,又如冬夏之时,无偏无私君临一切,其胸襟犹如高山大谷,包容万物。君子有德,四方赞誉;城主有德,家主尊敬;亲属有德,举族尊荣;一户有德,全家兴旺。天无所亲,唯助有德之君。万千杂草,不及一茎香草,人皆爱之。

又曰,君子者,不损人利己,不非人是己,不卑人尊己,不毁人誉己,不交往不当之人,不报复与己有怨之人。再曰,君子施恩不图报,无功不受禄,不当之物不用。先人之行,唯重德诚。今人多行伪诈,诸种善事不行其一,诸事之中常怀贰心,善恶相混,正邪并行,清变为浊,曲变为直。凡此一切者,皆为愚蒙小人,虽身居高位,仍是不幸与灾难之不尽根源。

除了儒家思想,西夏人还接受了道家思想,因为在上述所说的语录体文集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老子、庄子、列子和淮南子等人的言论和观点。除此之外,藏品中还有少量的宣扬道家高于儒家的伪经作品译文集,

书中有时将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路置于相当可笑的尴尬境地。但这种伪经作品非常少见,藏品中的《孔子和坛记》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

《圣立义海》也属于西夏人自己编写的原创作品,只可惜,藏品中保存的《圣立义海》并不完整,据目录判断,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共分5卷,15篇,它几乎是完全仿照了汉文百科全书的结构和体例所编写。以下是该书各篇内容的目录简介:(1)天空、太阳、月亮、星座和星宿;(2)天象,如云、雨、雪、雹、雷、电、虹、风等;(3)年、月的概念;(4)大地和高山;(5)植物;(6)矿产、河流、湖泊、舟船、桥梁、田野和农具;(7)禾本类植物、宝物和织物;(8)服饰和饮食;(9)动物;(10)国家统治者(太后、皇帝、皇后、太子、皇子、大臣);(11)宗教、官署衙门、军队和武器;(12)建筑、城市、器皿、饰物、工具、度量衡、牲畜挽具、乐器;(13)人事及人伦;(14)亲属、孝道;(15)男人、女人、仆役、友情、财富、贫穷、道德。

仅从该书的目录即可知道,如果它保存完整的话,就会为我们提供西夏生活方面的很多内容。此书是由简短的诗体格言构成,附有小字注释,有时注释得非常详细,还有大量的引自西夏文和汉文书籍的事例。此为本书第3篇残片中关于年、月概念的部分译文:

八月,桃子、玫瑰、刺槐和葡萄都成熟了,收割成熟的大麻、煎烤果实...提炼油脂。

十一月属鼠。在冬日的最中间一天里观察云彩,如果云彩是黄色,将预示着来年五谷丰登,会获得丰收;如果云彩为绿色,则预示来年会遭受虫灾;如果云彩是白色,则预示着来年疾病流行,会有死亡;而如果云彩呈红色,则预示着来年有战争和刀兵之灾;如果云彩为黑色,则预示着来年会有水厄之灾。

在十二月末的冬天,雪豹和虎交配,来年七月产崽。农人们为第二年的耕作做准备,开始修理和打磨农具。

根据汉文史料记载,曾官居宰相的西夏学者韩道冲撰写过卜筮类书籍《周易卜筮断》。我们从上文中也已经了解了西夏人根据云彩占卜的情况。在西夏,各种筮术都很盛行。藏品中有两、三部依据星相占卜的写稿文献,其中一部名叫《五星秘籍》,根据序跋判断,它是由党项人骨勒仁慧于乾祐十四年(1183)所编著。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有一幅西夏“面相图”的写稿残片。俄藏西夏文献中还存有各种记载筮卜的短记,像什么卜算胎儿性别、根据乌鸦叫声卜算吉凶、按方位标记和五行八卦等预测祸福的方法。可以看出,西夏所有这些筮卜类作品都曾受到汉文化和汉族筮卜体系的深刻影响。藏品中还发现有西夏的历书和少量的医学文献。有一份关于“紫苑丸”制剂的介绍,说此药治疗各种病症,并列有详细的成份、剂量和制

剂方法等处方,最后,还列举了中国史料中所记载的服用该药治愈各种病症的成功病例。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份简短的关于针灸疗法的文献残片。我认为,这两份医学文献,如果不是汉文医学著作的译本,那它肯定就是参照汉文医学文献所编著的。还有治疗马病的医方,有几份文献中还提到了如何选马的方法。

俄藏文献中还有一部颇引人注目的法律文献《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1149—1169),为刊本,共20卷,保存几乎完整,是由一个众多学者组成的庞大委员会共同起草制定。通过对此书的研究可以了解西夏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关系等情况。在《天盛律令》的起草班子中提到了几位翻译汉文资料的译者,这不禁使人联想到,该律令可能是在参照宋朝法律的基础上,结合西夏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一部法律。除此之外,藏品中还有另一部法律写本文献,名为《光定猴年新法》(1212)。

西夏的诗歌深受汉、藏文诗歌的影响,以五言和七言诗体最为多见。但它们是否也像汉文诗歌一样,存在押韵的现象呢?在没有完全确定西夏文的发音问题之前,还难以对此作出回答。西夏的诗歌有《碎金置掌文》,这是一部由1000个单字组成且毫不重复使用的五言诗体文,它大概与汉文《千字文》一样,是为初学识字者便于记忆字的读音而编写。但党项人除了五言或七言形式固定的诗歌以外,更喜欢那些句式排比严格工整的诗歌,每一句中的音节数目倒不一定非要相等。我所见过的诗歌当中的各句音节数目,一种是7,7,10,7,7,10,10,6,11,6,6等;另一种是6,6,11,6,6,6,7,6,6,7等。我们从那首献给制蕃字者伊利大师的颂歌当中就能感受到使用强烈的排比句式的奇特效果。西夏人在自己的诗歌当中大量借用汉文化的很多成份,使用汉文词句并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比如在诗歌中我们常常会遇到某些中国古代君王的名字,从儒家的观点来看,他们属于完美而理想的人间君主,如尧、舜、汤、武、周文王等。西夏借用汉文化中的某些概念有天地、八方、四海、天下、万岁、明君、皇宫九重大殿、北斗七星等。西夏宫廷颂歌中遇见的汉文词句有虹霓、獬豸、紫芝等。与汉文化思想一起并存的还有佛教文化思想,西夏人从佛经中借用了许多概念,如须弥山、娑婆世界、梵天王、弥勒佛、舍利、甘露甘雨、三生、金口玉律等。下面是几首西夏诗歌的片段译文:

尧舜至善世无比,不言父兄恶行径。文王喜与民同乐,亲子人子视同仁。

另一首颂歌曰:

大千世界无可比,白上国中圣明君。怜生之念比天高,憎死之行比地阔。

擎天之柱无谤怨,辅国臣子皆忠诚。治国一心学尧舜,教民唯思效汤武。

皇天之下皆顺服,陆地之上他作主。八方国君不生怨,四海之民共太平。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西夏还有一种诗歌形式,我将它

们译作“格言或对联”。这一种严格对仗的句子,通常是两句,每句都有同样数目的音节,一般在3—18个音节之间,最常见的是每句7个音节。这些格言对联的有趣之处在于,其内容除包含有各种借用邻近民族的东西外,还有本民族真正的民间创作和表现民族智慧和民俗的粹。它们与现在的“谚语”很相似。这一类格言对联在《圣立义海》中有很多很多,可谓是俯首皆得,它们用诗歌的形式表现,似乎还有押韵的现象。下面例举其中一、二:

1.聪明的男人注重女子的品行,愚蠢的男人看重女子的容貌。

2.拥有牲畜不算富,拥有智慧才算富。

3.大哥继承祖业,弟兄到处游宿。

俄藏文献中还有一部专门收集西夏格言对联谚语的书籍,名叫《新集锦合辞》,根据前言和后记内容判断,此书是西夏学者梁德养收集当时的民间口传格言对联谚语后,于1176年编写完成,从姓名来看,编者应该是位汉人,但由于作者早亡,未能及时出版此书。后来,另一位西夏学者王仁持将书稿整理校勘后,于1187年付印出版。现将《新集锦合辞》中格言撮录几例,译之如下,以窥全貌:

1.蚂蚁无论怎样努力,也比不上狮子王。苍蝇无论如何打扮,也比不上金翅鸟。

2.不孝敬父母,会增加不幸与痛苦。不尊敬贤者,会降低成就与知识。

3.世上爹妈最亲,骨头上的肉最香。

4.愚蠢的儿子骑在聪明父亲的头上,父亲一死,他就会跌下。

5.聪明的儿子站在愚蠢父亲的下面,父亲一死,他就会升起。

6.拉不动弓,就不要放箭。说不好话,就不要开口。

7.薪俸微薄的人更关心国事。不漂亮的妻子更忠诚丈夫。

8.毫无渲染的两种美丽是绿色和青春。掩盖不住的两种丑陋是贫穷与衰老。

9.富人家的牲畜再多,当败家的儿子长大,也会将它们耗尽。

穷人家的财物再少,当幸运的儿子出生,也会离财富不远。

聂历山《西夏国名校考》,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简报》第2卷,第3期,1933年。

聂历山《西夏研究历史概述》,载《西夏语文学》第一卷,第20页。

N.Nevsky,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saka, 1926.

Stuart N.Wolfenden, On the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f Si-Hia words,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1.

10.干大事不可着急,出远门不必匆忙。

11.冰消水出,云散月见。

12.鸟栖胸对风,鱼眠头迎水。

13.钟爱美丽,就不会雄强。过分尊礼,就无法勇敢。

14.不可抗拒的死亡就是用铁链也阻拦不住。转瞬即逝的光阴即便脚步如飞也追赶不上。

15.狼吃饱了以后会留下残羹,贼偷了以后会留下踪迹。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俄藏文献中有很多西夏辞书,这表明当时对党项人来说,一切与他们的象形文字有关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并急需解决。除《掌中珠》以外,藏品中还有其它各类词典,从最基本的按已知发音顺序编排的词汇目录表,到按声调、韵律编排的详解词典,以及语音语义学词典等。后一类词典是按照汉文的字形字意分析法,即反切法,用西夏字来解释的。认真研究所有的这些反切字及相应的,仿照汉文编制的西夏文发音表,有助于从理论上认清并构拟出大部分西夏字的发音。

藏品中还有一些附有藏文音译的西夏文文献残片,也是研究西夏文发音问题的重要资料。另外,大英博物馆珍藏的斯坦因收集品中也有少量的此种文献。

除以上所说,俄藏文献中还有很多官方文书和债务契约,这对于我们弄清西夏的历史和经济问题有很大的意义。但由于这些文书契约全部都是用西夏文草体书写,我至今尚无法释读其内容。但我希望,通过逐渐研究西夏文草书及字的简化书写规律,依据由汉文或藏文译成西夏文的那些文献材料及汉、藏文原本文献,加以对照比较,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些文献的研究一定会透出些许光明。

以上所述,乃是对苏联科学院所藏部分西夏文献作一简要介绍与描述,由此也可知,俄藏西夏文献对西夏研究的各个方面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俄藏西夏文献与世界上其它各处所藏西夏文献相比,在数量上超过几倍,在内容上也广泛丰富,独一无二,其它藏品根本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我认为,今后的西夏研究工作,应沿着研究和整理、公布重要的西夏文献资料的方向前进,并着重研究西夏的政治、经济问题,为此,首先应当研究西夏的法律文献。

Stuart N.Wolfenden, On the prefixes and consonantal finals of Si-Hia as evidenced by their chinese and tibetan transcriptions,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4.

传说中的一种独角瑞兽,能分辨是非曲直,古代执法机关将其图像作为司法公正的象征。

传说中的一种灵瑞植物,生于尧帝之庭院,能识辨诡诈奸邪之人。

[责任编辑 方建春]